

• 左尔格在中国 •

方文著



左尔格在中国

左尔格怎样教导我走上情报战线

方 文

前 言

在我青年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我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但革命工作是有许多种类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等等。在我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徬徨时刻，是左尔格领导我走上革命情报战线的。对我来说，这工作是前所未闻和一无所知的工作。在不知不觉的具体工作中，使我了解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使我和这一工作建立了感情，热爱这一工作，决心为这一工作献出自己的力量。

左尔格对我在青年时代的启蒙教育以及他后来对我的间接影响，奠定了我这一生所走的道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体地运用在革命情报工作的实践上去，使我认识到情报侦察工作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在许多具体工作的事例中，使我深深地感到这一工作对革命成败的重大影响。我帮助他在上海建立了对国民党政府情况的侦察工作。我们日日夜夜在一起工作达三年之久，直到他于一九三二年冬离开中国返回莫斯科为止。从那时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或通过讯。但他后来在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对他钦佩之余，更增长了我在这条战线上工作的感情和勇气。

大家都知道左尔格是一位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莫斯科的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并给他铸造了铜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作家称赞他是对人类历史进程起过重要作用的传奇性人物。一位被苏联派到日本作侦察工作的德国共产党员，取得这样高的荣誉并非偶然的，而是和他的政治素养、智慧、勇敢和经验分不开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行了大兵团的突然袭击。在苏联首都莫斯科陷于被敌人占领的危险时刻，是左尔格从日本东京发给斯大林的一份战略情报，对苏联首都的转危为安及苏军从退守转为反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使我更加深了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更热爱这项工作。

当时莫斯科如陷落，希特勒必向全世界宣布法西斯主宰世界了。人类反法西斯斗争必将陷于更加艰苦的境地。西方学者给了左尔格这样高的荣誉，就因为左尔格的情报对法西斯统治世界的趋势起了阻止的作用。

左尔格在日本进行秘密情报工作达九年之久，完成了他的伟大任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他即将结束日本工作，返回莫斯科之前，由于某种意外的与他的工作无关的原因，被日本政府逮捕了，全部组织被破获了。但日本政府对他的案情保守秘密，外界很少知其内情。直到日本投降后，左尔格的案卷首先被美国发现，他们如获至宝，编成教学材料，印发给美国情工专业学校使用；后来又作为反苏、反美共的根据，在美国国会进行研究，并载入美国国会记录里。从这时起，世人对左尔格案才有所知。

一九六二年日本所发表的《现代历史材料，左尔格事件档案》，才把左尔格案全部情况公开发表了。这材料使我出乎意外地发现我也是日本所追寻的左尔格案中的犯人之一。这样就使我和左尔格在东京的工作联起来了。在他的供词里说，他在上海认识了一个中国人，给他做翻译工作。原话是：

“渐渐地我和他很熟悉了。因此，我和他畅所欲言，没有一点保留。和他相处两三个月以后，我直接要他参加我的组织，同时还要求他介绍适当的朋友和亲戚，帮助我们工作。这个中国人是姓‘王’，不久他的太太也加入了我的组织。”

“在上海的时候，我主要是和王君一道工作。唯有特殊情形才和其他人员共同从事，但要把讨论的话头减得越少越好。……”

“我们会面的时间是深夜，地点是私人的房子，例如在王君的家里，或者为了便于我的赴会，则采用外籍工作同志的家里。”

这个姓王的人是谁？当然是日本司法部门和特务机关所欲追查逮捕归案的重要对象，因为那时日本几乎已侵占了整个中原大地。上海、天津和北平等大城市都成为沦陷区。如容这个左尔格的伙伴继续在这些城市活动，必对日寇的统治不利。他们曾派专人到上海搜查这个姓王的“要犯”，但是一无所获。其实那姓王的以及曾在左尔格领导下另一位重要的中国同志，仍在上海工作。当然那时他们对左尔格的被捕事一无所知，因而也不可能作任何特殊防备。后来姓王的因另外原因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从秘密电台被破获的线索逮捕了。经过无休止的审讯，也未发现这个人就是他们日夜所搜寻的对象。由于看管不严，这“要犯”越狱逃跑了。他们如知道这人就是左尔格所供出的那个姓王的，早就押解到东京归案，并和左尔格一同上绞刑架了。

日本宪兵队所以抓不到这个姓王的原因，我有深刻确切的体会，因为这个姓王的就是我。只因左尔格在供词里略施小计，就把敌人骗过去了，保护了我，使我得以在敌人的刀口下躲开，至今健在，并得以为左尔格这位老战友和导师作证。敌人为了扩大案情，曾清查它占领的上海、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地下抗日组织，左尔格当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左尔格把他的上海下属集中到一个姓王的身上，以保护其他人的安全。他所供的姓王的情况有真有假。凡不危及老战友们安全的都是真的，而危及老战友的安全的真实姓名和通讯地点以及曾居住过的地点都是假的。

他所供出的姓王的这个人虽是我，但我并不姓王，也从未使用过王姓作为自己的假姓。当敌人追问他这姓王的名字时，他答以中国人的姓名很难记，都忘了。姓是假的，名字没有。敌人把我抓住后，也不能认出我就是左尔格所供出的那个姓王的。

从我亲身的经历看，左尔格在敌人面前保护了同志，保护了

组织。我就是被他保护的人之一。如果他向敌人提供了我的真实姓名、形象特点和我们在上海活动规律，不难认出我。并将从我的活动线索找到当时在敌占区的我们党和苏联的侦察组织。因为我和他们在上海的侦察组织都有工作联系。特别和我们党派到上海的领导人潘汉年同志既有工作联系，又有个人联系。所以左尔格也间接地保护了我们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美国获得左尔格案卷后，对他在上海的活动也很重视。曾派美国在日本占领军总部的情报处长魏劳拜于一九四八年到上海调查左尔格的材料。在蒋介石政府的帮助下，把旧上海外国租界地巡捕房的档案都找出来，从中查寻左尔格的活动材料。后来魏劳拜写了一本数百页的书，在美国公开出版了。书名《上海间谍网》。但书中的材料多抄自日本的左尔格案的档案，并没收集到左尔格在上海的材料。因而，左尔格在上海的情况仍是一个谜。

我作为左尔格在上海工作的助手，有责任把这个谜解开。用以介绍左尔格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当然我并不可能把他在上海全部工作都介绍出来，只能介绍我所接触和主管的事件。特别是他怎样领导我走上情报侦察战线的经过，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为使这位历史人物尚未被人所知的一部分事业，用本书给以记述。至于他在日本如何完成他那对人类命运有关的战略情报任务，容在另一本拙著中介绍。因为他在上海的工作和他后来在东京工作是相互关联的。东京的工作是从上海工作发展起来的，是总结了上海工作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这样说，如没有上海工作就不可能有东京工作。因此，我这本书只是作为了解左尔格在东京的成就的一些背景材料。也可以说，是一个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如何在左尔格的教导下，走上革命侦察工作的实录。

著者 方 文

一九八八年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第 一 章	初 晤	(1)
第 二 章	考 验	(9)
第 三 章	求 证	(19)
第 四 章	定 性	(24)
第 五 章	组 建	(31)
第 六 章	小 试	(40)
第 七 章	发 展	(55)
第 八 章	武 装	(68)
第 九 章	突 破	(79)
第 十 章	转 移	(92)
第 十 一 章	骤 变	(103)
第 十 二 章	余 音	(117)

第一章 初 晤

那是在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广州接到上海一位老战友的来信，嘱托我照顾由上海去广州参观游览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

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个名字接触，以前未曾听说过，不知是怎样一位美国朋友。我按上海来信告诉她住的旅馆前去寻找。在广州第一流的旅馆里找到了她。

当我通了姓名和介绍人后，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不放，表示见到我很高兴。她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体格健壮，双目闪烁着刚毅的光芒。她言语果断坚决，富于感情。

我告诉她，我是广州东山一个美国教会女子中学教中国语文的教师。

她立刻追问教书多久了？

从她的发问中我感到她是性格直爽的急脾气，急于全面了解她所要了解的事。虽然事情并不重要，她也要知道个水落石出。

我继续告诉她说，我和我的爱人于是去年秋天带着一岁的幼子从上海来到广州教书的。因为在上海无法生活，能够典当的东西都典当光了，不得已才来教书，纯粹为着糊口。我在一九二八年夏蒋介石占领北京后，为着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从北京逃到上海。

她又急不可待地问：“那末你是反对蒋介石的？”

当我点点头后她又追问：“那末你是共产党员么？”

在当时反共的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似这样的有关个人安危问题，既不应轻易向人提出，更不应轻易向人追问。第一

次见面，她就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应如何回答呢？

她这样提问题并不说明她粗鲁不通世故，而说明她和我的上海老朋友已有较深的友谊，她把我也作为一个老朋友才敢向我提这问题。因此我毫无顾忌地把真情告诉她。我告诉她：“我脱离党组织已有一年多了。蒋介石进北京后，当地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我失掉了组织关系。我到上海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寻找党组织，但还没找到。”

她似乎对我的问题非常关心。她又打断我的话追问：“那末你以后怎么办呢？这里的教书生活满意么？”

我回答说：“决心放暑假时辞掉这里的职务，回上海继续寻找党组织。”

她又问：“你们现在的生活待遇怎样？”

我回答说：“还不算坏，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得到象我们这样的职业就不错了。学校备有宿舍，我的月薪六十元小洋，我的爱人三十元小洋。”

她又急不可待地追问：“什么是小洋？”

我告诉她说：“广州的陈济棠并不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管辖地区使用的货币是大洋，广东使用小洋。一块小洋的价值比一块大洋小得多。”

我们第一次谈话的内容是互相自我介绍。如上所记，我的自我介绍多于她的自我介绍。我更不习惯多问她的身世，只听她简单地说说而已。我了解到她是德国有名大报《法兰克福日报》的驻华记者，到中国已一年多了。经苏联从我国东北入境后，见到中国劳动人民的穷困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深深印在她的心里。她在我国东北收集了不少有关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人的通讯材料。她还谦虚地告诉我，她写了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名《大地的女儿》，她表示要送我一本，借以了解她的身世，增进我们相互了解。

这是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首次谈话，却又是一次似乎老朋友久别后重逢的谈心。因而我们的谈话似乎是一条割不断的线，不能不约定下一次的见面，她还希望我携同我的爱人鲁丝一起到她那里去玩。

只过了两天，我和鲁丝如约再去看她。不意在她的房间里有一位外国男人在座。我们本想退出，过一会再来，以免打扰她接待这位客人。她却立刻赶到门口，未经介绍就拉住鲁丝的手说：

“你不象是中国女人，象匈牙利女人。不用介绍了，你一定是他的爱人。”

她这样直爽明快，使我们夫妇俩都感到吃惊，这是在交际场合未曾遇到过的新鲜事，当然我们从此就喜爱这位美国大姐。她挽着鲁丝的手走进屋里，我也跟着进去了。她随即用英文向我们介绍说：

“这位是约翰逊博士，德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

约翰逊博士迎着我们走了两步和我们握手，也用英文说，很高兴见到我们，他也是刚到广州，希望我们多多帮助。

他这简短的话，使我感觉到似乎我们夫妇和他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史沫特莱的安排下见面的。对我来说当然很突然，不知应如何回答。只简单表示愿为他效劳。

约翰逊身材魁梧，高鼻梁，大眼睛，言语简洁，给人以深沉持重之感。史沫特莱见我们夫妇很拘束，就以老朋友的姿态使这不自然的气氛融解开来。她立即向我们夫妇提出一个要求说，她和约翰逊博士都刚到广州，拟作些农村经济情况和工厂工人情况的调查，要住一些时间，住旅馆不方便，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租一小幢住房并配备必要的家具，不知我们是否能帮忙？

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是到广州不到一年的“北方佬”，对广东话只学会了简单几句日常用语，为他们选租

一套较如意的住房当然很困难。但我们不便表示任何困难，更不能当面拒绝，只好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对我们所表示的热情帮助，当然很高兴。所以这次会晤，主要谈租房子问题。他们对租房事提出更具体的要求。房子地址最好不要在闹市，但也不要太偏僻，以免交通不便。房子要独门独院，不要和别家合住一个院里。我们只好都答应下来。

我们辞出，在归家路上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满足这两位外国朋友的要求。我们如不能办到，不但表现我们无能，更表现我们对朋友的帮助不热心。我们就这样如负重担似的回到家里。那时我们家里雇用了一位抚养我们刚过一周岁多的儿子小宝的广州保姆。那天夜里，鲁丝无意中问了保姆一下关于租房子的事。保姆回答说，广州东山是外国传教士和中国阔人的居住区，找房子很容易，有专作出租房子生意的商家，去找这种商人是不难解决的。她的说明使我们很高兴。第二天保姆带着我到一家房地产出租公司，我以东山知名的教会女子中学的教员的身份，提出为一位美国女朋友代租一幢住房事。这公司即派了一位职员带领我去看房子。在从东山去市区的大街上的拐角处有一座小楼，屋内配有全套的家具。这小楼我认为很适合史沫特莱单身租用，或与约翰逊博士分住也够用。我很高兴，因为我认为我对新朋友的第一次帮助总算完成了。我立即把这事告诉了史沫特莱并建议她去看一看。她听了我的说明，认为正符合她的要求，也未亲自去看就请我代为租下来。几天后就住进去了。

由于这房屋离我家很近，常去她家谈心，有时遇上约翰逊也在这里。话题都是我向他们介绍一些极普通的广东政治情况，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没有什么内幕材料，但他们却感兴趣。在六月底，我们夫妇到她家向她和约翰逊辞行。我们已向学校辞职，即将返回上海。他们表示过些时也回上海，到那时再见，并望我向介绍她和我相识的那位老朋友问候。我们就这样分别了。

在广州偶然遇到这两位外国朋友，并帮助他们安排了住处和介绍了广东的政治与经济情况，本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事过境迁后，也就在记忆里淡薄了。只觉得这两位外国人和我过去所接触的外国人不一样。过去我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时，所认识的外国人都是基督教教徒或传教士。学校的教授专家，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上海所接触的外国人，都是殖民地开发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民族的征服，主要靠这样两支队伍，一文一武。我自从读到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后，对这两种人有了本质的认识。特别对披着基督教虚伪外衣的神父牧师的欺骗性、麻醉性有了了解，对他们有一种憎恨之感。而现在遇到的一位美国女作家和一位德国男博士都不同于上述那两种人。他们既不是以上帝的代表资格来“拯救”中国人的，也不是那种从飞机战舰走下来的盛气凌人的征服者。他们来自马克思的故乡，使我感到他们举止言谈中散发着革命气息。虽然他们并没有谈论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没有表示他们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却能使我敢于在他们面前承认自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具有一种使人敢于向他们推心置腹的感染力。我曾后悔不应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曾责备自己过于冒昧。却又感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不然，何用我们替他们租赁宿舍。美国和德国是蒋介石政权得以巩固的靠山，在蒋介石统治地区最吃香，在生活上能得到国民党机关的照顾，不论哪一派都不敢对他们怠慢，何必找我们呢？由此可见他们与中国官厅没有联系，而且和他们各自国家驻华机关，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德国军事顾问团亦无什么来往。他们并未由他们各自的政府代表机构通知国民党机关对他们给以照顾，所以才由能力很差的私人朋友帮忙。

我从这样分析感到，和这两位朋友相识是值得的，对他们的帮助是应该的。我对他们谈心是双方情感的交流结果，并不是我

的失言。可惜相识时间太短，只一个多月，我们就回上海了。如果能有较长时间相聚，定能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东西。但由于我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心切，在我见到他们以前，已向学校当局提出了辞职。不可能由于他们的到来，使我对于自己的行止有所变动。所以他们的到来，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回上海的决心。

回到上海后，我们一家三口住到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家里。他们两位同志是我的大学同学，就不客气地住到他们家里。我在广州接待史沫特莱就是由他们介绍的。正好向他们报告她在广州的情况，并共同交换对史沫特莱的看法。董、蔡两位同志对我们全家的到来给以热情的接待，毫无任何不悦或为难之意。在他们住的一上一下的上海弄堂里的小楼里，硬是为我们腾出一间房来居住。这因为我们彼此的关系太深了，共命运，同患难。更由于我们志同道合，从学生时代起，就携手前进了。特别是董秋斯同志，对我的一生所走的道路有重大影响，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给以较多的介绍。

董秋斯原名董绍明，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曾翻译苏联作家的《士敏士》和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他在文艺界比较广地为读者了解，但在政治上却很少为人所知。他是在北伐战争时参加革命的，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毅然站在共产党一边，脱离军部到上海作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翻译工作。他那时已身染肺病，身体虚弱，更加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不时就有被捕危险，但他全然无所惧，和他当时的爱人蔡步虚（原名蔡咏裳）共同翻译了苏联的革命作家描述苏联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英勇艰苦的斗争的故事。这是一本数十万字的巨著，但他们夫妇在较短的时间里翻译完后出版，对许多徬徨歧途的知识青年指出前进的方向。这也是蒋介石所最不允许的。所以他这书的出版，一方面获得党和进步人士的重视，另一方面遭到反动派的

忌恨。他就是在这时认识了革命作家如鲁迅、冯雪峰等。史沫特莱也是在这时与他相识的。他们的一见如故，是由两本书作介绍物的。那就是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董、蔡合译的《士敏士》。

《大地的女儿》告诉读者，史沫特莱是一位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妇女求生存、求知识、求女权的坚强革命家。这本书的问世传到中国后，使许多中国人士对她产生敬重之心，许多学者、作家很快和她成了朋友。如宋庆龄、鲁迅、茅盾、董秋斯等。

在蒋介石政府反苏反共反工农政策极端猖狂之际，董秋斯敢于向国人介绍苏联革命成就的著作，当非一般懦弱者所敢为。自然被史沫特莱所重视，也很容易被她所敬重。故此，她来到上海不久，他们就相识了，并成了政治上的战友。

以上这些情况，是我到上海后，从董、蔡的谈话中了解的。使我感到能认识这样一位外国朋友是很荣幸的。回想我们夫妇在广州对史沫特莱的态度也是对的，因而也就心安理得了。但关于在史沫特莱住处所认识的那位德国人约翰逊博士究竟是怎样的人，董、蔡亦无所知，也没见到过，因而就不能有进一步了解。

董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和党中央工作人员有许多联系。我也请他把我的要求转告党，我急盼党对我失掉党的关系，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如无问题，我请求组织尽快让我进入党的工作岗位上去。董告诉我，他已早向有关同志谈过我的问题了，由于我不在上海，不能直接联系，所以就拖下来了。现在既然回到上海，当面谈一谈，他认为不难解决。一旦组织问题解决了，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望我别着急。

他的说明，使我非常高兴。我遂和爱人商量，先把我们的幼子送到天津我的父母那里去，以免我们参加工作后成了累赘。因为那个时期，革命工作是非常艰苦危险的。党的组织不时被敌人

破获，人员被拘捕和杀害。为着革命后代的安全，应该把孩子送走，免受牵连。我们一致同意这样作，但由鲁丝一个人送去，我的父母不一定同意收养，所以我也必须同去，说服力就大些。我们遂以探望老人为名，带着幼子到了天津。老人家对于第三代的孙子当然爱护备至。我们夫妇遂制造了一个可以宽恕的谎言，促使老人家非留下这个孩子不可。我严肃地说：孩子和我们在一起经常闹肚子，因为我们到处跑，孩子不服水土，总是拉稀，重时一天拉十几次。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着找职业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广州，变化很大，孩子太小，适应不了。再这样跟着我们乱跑，说不定这孩子活不长。老人家听到这话，非常惊讶，未等我们请求，就主动说，留在家里罢，免得孩子吃苦！寄托孩子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我们夫妇在天津和北平住了一个月，就回上海了。

第二章 考 验

回到上海后不便再住在董秋斯家，遂在法国租界租了一上一下的小楼住下。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他告诉我，史沫特莱也住在附近，他常去看她，但她去广州已四个多月还没回来，估计不久即将回来。当然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工作问题，极望得到党组织的安排。董建议我暂时参加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的活动，接触一下群众，学习一点革命宣传工作。上海当时有两个由党组织领导的群众团体，一个是“左翼作家联盟”，一个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前者简称为“左联”，后者简称为“社联”。任我选择其中之一，他可以作介绍人。两者我都想参加，一时决定不下来。我在大学是学政治学的，当然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所谓“民主”，所谓“议会”，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参加共产党之后，从思想感情上知道那是资产阶级所遵守的规律，压迫无产阶级的手段。但仍认识不清楚其本质。幸而我在过去这一年的教书生活中，使我有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充裕时间。因为我的教书时间每周只有六小时，得以集中精力读《资本论》。那时在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只能读英文译本。我从上海商务印书馆买到《资本论》第一卷。这本书使我从一个同情被压迫人民的知识分子，变为有一些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本书使我不能安坐在广州东山的风景幽静的小别墅里，我必须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里去。我在读这本书时，如饥似渴地写了十多万字的笔记。因为它使我这个读过二十年书的人，现在才真正有了些知识。懂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

品的本质。懂得了人剥削人的残酷程度。我是怀着这种心情坚决地离开广州，到上海找党的。现在在董秋斯的帮助下，使我能重新走上阶级斗争的战场，当然我很高兴，急欲立刻走进“社联”的行列里去。但又不愿放弃参加“左联”的机会。“左联”的领导人鲁迅、茅盾、夏衍、潘汉年等，都是我崇敬的革命先驱者。如有机会能得到他们的指导，将是我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当然，在“社联”的领导人里也有王学文、杜国庠、邓初民等社会科学家，但那时他们的著述不多，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那时的考虑并不是从工作的需要，而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思来想去，一时难于决定，不得不请教董秋斯。

董秋斯同志明确向我指出，我既是学社会科学的，当然应该加入“社联”，我就从那时起参加了“社联”。他介绍我和一位姓柳的同志相识。由这位同志带我到一家住宅参加第一次小组会议。这次会的参加人有七个。经介绍，我认识了杜国庠、邓初民。那时已临近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我在这次会上得知，国民党以及托洛斯基派为着抵制苏联的十月革命节的庆祝，特约请国际间反苏名人，第二国际总书记温德威鲁特（比利时社会民主党领袖，曾任过比利时政府首相）到上海举行公开反共反苏演讲。我们的“社联”不能不有所还击，究应采取何种形式，大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后，至今已有三年，不但未能消灭中国共产党，反而越杀越多，并且在江西井冈山产生了中国红军。蒋介石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对红军进行“围剿”。而现在又企图利用第二国际，在上海知识界里散布反共谬论，我们作为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出来予以回击。

有的同志认为，这次工作的政治意义很大，必须表示在上海知识界里并没有第二国际的市场，希望他不要做屠杀中国人民刽子手的帮凶。